

中国



皇帝皇后

全传

成思远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拓跋宏

成思远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成思远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0723-146-7

I. 中… II. 成… III. ①皇帝—列传—中国
②皇后—列传—中国 IV. 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581 号

中国皇帝皇后全传

主 编: 成思远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600 千字

印 张: 518.5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46-7/I·46

定 价: 2580.00 元(全 100 册)

目录



第一章	拓跋部的崛起	(1)
第二章	生于皇家	(23)
第三章	太后临朝	(34)
第四章	政归孝文	(61)
第五章	班行俸禄	(71)
第六章	均田制、三长制	(77)
第七章	迁都洛阳	(93)



第一章 拓跋部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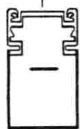
拓跋部是鲜卑族的一支，其祖先散居于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嫩江西岸支流甘河上源一带。拓跋部的崛起是古代北方的一部英雄史诗。

《魏书》卷一《序纪》说，在遥远的上古时代，黄帝把最小的儿子昌意封在极北，昌意就是拓跋部的远祖。从此，在这“幽都之北，广漠之野”，拓跋部的祖先“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这段记载，朦胧地反映出早期拓跋部世代在深山密林和大漠荒野中从事畜牧与狩猎，处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情景。

根据史籍记载，早在西汉王朝击败匈奴，并将原先分布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一带的乌桓部迁徙至辽东、上谷五郡塞外后，鲜卑各部即散布于西拉木伦河至今甘肃洮河之间的广大区域内游牧，势力日渐强盛。而此时，早期拓跋部尚滞留于极北。

拓跋部的崛起，是与其祖先的两次著名的南迁分不开的。

一次是在部落首领“宣皇帝”推寅时（大约相当于东汉初期），南迁到“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这一带，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所谓“大泽”，当是今内蒙古呼伦湖。拓跋部祖先来到草原上，与一些经济文化较为先进的民族为邻，从他们那里学会了制造和使用铁器，物质生产力有所提高，贫富分化逐渐出现。在长期民族杂居的环境中，拓跋部祖先的血统关系逐步发生变化，这才形成了具有混血特色的、严格意义上的拓跋部人。所以相传拓跋部人是“胡父鲜卑





母”的结晶。

当拓跋部徘徊于呼伦贝尔草原的时候,历史的车轮已经缓缓地驶进了公元二世纪。当时的鲜卑首领檀石槐勇敢多谋,在距高柳(今山西阳高)北300多里的弹汗山啜仇水设立牙帐,东征西讨,于东汉桓帝(147—167年)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部落联盟,“南钐汉边,北拒于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拓跋部也曾加入过这个部落联盟。但是,檀石槐死后,联盟很快分裂,而且“大泽”一带的自然环境仍然不够理想。于是,拓跋部决定开始第二次南迁的壮举。当时的“献皇帝”邻命令儿子诃汾率众南移,经过“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到达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游牧。这时,大约正值东汉与曹魏之际。后人把“献皇帝”邻与“宣皇帝”同样叫做“推寅”(邻即第二推寅)。鲜卑语的“推寅”一词有“钻研”的意思,被用来纪念拓跋部的这两位先人领导部落南迁的业绩。在南迁过程中,邻还取消了原来的部落异姓酋长,把整个拓跋鲜卑划成八个部分,分别由自己和七个兄弟统摄,后来又增加两个部分,并称为十姓。这一举措,增强了部落内的凝聚力。

拓跋部经过十几代人的时间,跋山涉水,扶老携幼,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行程近2000公里,终于从极北的深山密林、大漠荒野中辗转来到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漠南匈奴故地。所幸的是,上述充满神奇和悲壮色彩的早期经历的梗概,由于世代口述相传而得以记叙下来。拓跋后辈每每为之感叹,总不免神驰千里,心旌摇荡。

云中一带,匈奴一去不复返,留下的只是丰美的水草和似乎还缭绕在空间的胡笳声声。拓跋部人在这里安扎帐幕,畜牧狩猎。他们的文明史的第一幕就要从这里揭开了。现在他们面对着的,是封建经济文化发达的汉族建立的曹魏政权以及后来的西晋王朝。

氏族首领制在诃汾的儿子拓跋力微时已经有所动摇。据说力微“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而且颇能笼络人心,“积十数岁,



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除“宗室八姓”外,还有 75 个异姓或非拓跋部的部落,组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部落联盟,其活动中心东迁到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258 年一次祭天,各部酋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这完全是《国语》卷五《鲁语下》及《韩非子》卷五《饰邪》所载禹在会稽山大会部落首领,“防风氏后至,禹杀而脔之”插曲的再现。力微简直和禹一样,俨然成为凌驾于各部落首领之上,手握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的君王了。尤其是在吞并了附近的没鹿回部落后,力微的势力大增,“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力微还有一定的政治眼光,不赞成匈奴式的一味劫掠财物。他曾经对别人说:“我历观前世匈奴、蹋顿之徒,苟贪财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长计也。”他采取和亲政策,派儿子沙漠汗到魏国都城洛阳观察风土人情,“为魏宾之冠,聘问交市,往来不绝”。拓跋部每年从魏国得到难以计数的金、帛、缯、絮等财物,促进了内部的贫富分化。据说力微末年,“掠骑得一奴”,似乎已经开始掠夺和使用奴隶。

禄官时,一度把拓跋部划为三个部分分别统辖,并且继续与中原保持良好关系,“百姓羸安,财畜富实”,据说“控弦骑士四十余万”,成为雄峙塞上的强大力量,这逐渐引起西晋王朝的注意。308 年,猗卢重新统一拓跋各部。由于西晋宗室诸王内部以及北方各族之间连年混战,中原大乱,晋朝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刺史刘琨向拓跋部借兵。猗卢慨然应允,率兵帮助刘琨大破进攻并州的白部鲜卑和西河(今山西汾阳)铁弗刘虎。猗卢因功被晋朝封为代公、代王,并且从刘琨那里取得了马邑(今山西朔县)、阴馆(今山西代县)、楼烦(今山西宁武)、繁峙和崞县(均在今山西浑源)共五县之地,势力从草原扩展到雁门关外。“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与魏、晋王朝的频频接触推动了拓跋部氏族组织的瓦解,阶级统治和法律应运而生了。

什翼犍年轻时,曾在后赵当过十年质子,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他继任代王后,建盛乐新城,并且“始置百官,分掌众职”,



模仿西晋建立起初步的官僚机构,延聘汉族士人燕凤为左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同时制订“反逆、杀人、奸盗之法”。这样,拓跋部形成了以盛乐新城为中心的国家的雏型,并开始从事农业。什翼犍还曾征讨刘虎的孙子刘卫辰,俘获大量人口和牲畜。

不幸的是,什翼犍这时遇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氐族的前秦政权正在准备统一北分。376年,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军20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灭了代国,什翼犍被执送长安。这是拓跋部历史上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

淝水之战后,前秦土崩瓦解,各族纷纷重建政权。

386年,什翼犍的孙子拓跋珪在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南)宣布复国,称代王,不久改称魏,史称北魏,年号登国。拓跋珪即魏道武帝,是拓跋部的一位出色领袖。他立志恢复并重振部族雄风,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北魏的迅速强盛引起北方大国后燕的不安。395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进攻北魏,到达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为避敌锋芒,拓跋珪带着部众、畜产,退到黄河以南的河套一带。来势凶猛的燕军收降北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稼田百余万斛,并造船准备渡河。但是经过几个月,燕军仍然未能找到魏军主力,师老兵疲,士气衰竭,不得不烧船退军。拓跋珪抓住战机,亲率两万精锐骑兵跨过冰封的黄河,昼夜追击,于参合陂(今山西大同东)大破燕军。慕容宝单骑落荒而逃,降卒四五万全部被坑杀。次年,慕容垂亲自率军前来报复,一无所获,忧愤而死。参合陂之战,是决定北魏生死存亡的关键之役。从此,北魏与后燕的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魏军乘胜攻入塞内,攻克并州,又从并陞直插并攻取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

在此过程中,拓跋珪注意吸纳汉族士人进入核心集团,崇礼教,辨宗党,立宗主督护,并且把东至代郡(今河北蔚县)、西及善无(今山西右玉)、南抵阴馆、北尽参合(今由西阳高)的代北地方划为畿内之地,作为北魏统治的重心,其外为“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临之。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迁都于平城(今



山西大同),将大量被征服地区的人民迁徙到代北,“分土定居”,“息众课农”,“计口授田”。拓跋珪还“建台省,置百官”,建立了一整套政治统治机构和礼制。拓跋珪的功业,为北魏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拓跋珪晚年,因宫廷纷争,精神失常被杀,明元帝拓跋嗣即位。423年,拓跋宏的高祖父拓跋焘做了皇帝。焘字佛狸,即魏太武帝,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始光三年(426年),拓跋焘派兵进攻大夏,占领长安;次年又亲率大军攻克大夏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俘夏主赫连昌。神䴥二年(429年),拓跋焘率军大破北边的柔然,降服30多万家,获马牛羊数百万头,敕勒族也有几十万人向北魏投降。据说由于大量俘获,北魏的畜产和毡皮都大之跌价。太延二年(436年),北魏灭割据辽东的北燕冯氏政权。太延五年,拓跋焘率军征讨北凉,包围其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沮渠牧犍出降。这样,拓跋焘时的北魏政权经过连年征伐,终于翦灭群雄,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北方130多年兵戈扰攘、分裂割据的状态,唯剩南方汉族政权与其隔淮相对。

这一年,距拓跋宏出生还有28年。

二

如前所述,在中国境内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带,从秦汉到北朝时期,先后活跃着包括匈奴在内的许多游牧民族。他们以畜群为主要财产,食畜肉,饮湢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逐水草迁徙”。他们体魄强健,英勇强悍,耐饥寒,善骑射,疾驰有如风暴。他们时常在边疆上发动掠夺战争,“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成为对中原王朝的严重威胁。

在进入中原以前的漫长岁月里,拓跋部也曾经是一个“控弦上马”、驰骋于塞外河套一带的典型游牧部族。虽然由于周围发达较早的民族的影响,拓跋内部的生产力早就有所进步,氏族公社组织已经逐步瓦解,但是传统的游牧经济,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的类型,仍然是与北方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



放眼望去，云中一带到处是苍苍茫茫，风吹草低，羊群遍野，牛马孳息的景象，“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有余里，每岁孟秋，马常大集，略为满川”。

而一旦进入中原，拓跋部所面临的，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这里土壤肥沃、气候湿润、适于农耕，并且曾经确立了数百年的土地私有制度，实行“民丁课田”的封建经济关系，“耕织种收，皆有条章”，经济文化水平高出北方少数民族的广袤的汉族地区。这两种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能否迅速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化，即适应汉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成了拓跋部政权能否在中原站稳脚跟的关键。摆在拓跋统治者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改革原先的经济结构，建立一套适于中原农耕和定居社会的统治制度。

但是，在北魏前期，这种转变对拓跋部来说并不完全是自觉的。西晋统治集团内部以及晋末以来北方各族军阀之间长期的疯狂砍杀，给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的浩劫，各族人民在苦难和死亡的深渊中挣扎。“自丧乱已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兵燹和灾荒造成的后果，是农业人口急剧减少，农业经济严重萎缩，所谓“诸夏纷乱，无复农者”，“民废农业”，原先农业繁荣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拓跋统治者根本无法依赖这种衰败的经济维持其庞大的财政开支，而且也出于传统习惯和四处征伐的需要，不得不在尽力恢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的同时，继续倚重原有的畜牧业。其主要途径是通过战争，大量俘获和掠夺牲畜，以班赐臣下，开辟牧场。早在道武帝拓跋珪登国六年（391年）平定刘卫辰后，即“簿其珍宝畜产，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班赐大臣各有差”；天兴二年（399年）破高车，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百四十余万”，“班赐从臣各有差”。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获“马五万匹，牛二十万头”。太武帝拓跋焘始光四年（427年）平定大夏，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竟达“数千万”。因此，在北魏前期，北方边疆的畜牧业仍在顽强地发展，“畜产滋息”。到拓跋焘时，还新辟河西



牧场，“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对拓跋部来说，转变自身的经济结构远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战争、征服和饥谨，使拓跋统治者获得了大量的俘虏和贫困卖身以及沦为罪犯的人，包括汉族和其他各个民族、部落的成员。拓跋统治者很自然地把他们作为奴婢和隶户赏赐给功臣勋戚。其中如许谦“从征卫辰，以功赐僮隶三十户”；长孙肥跟随拓跋珪“南平中原，西摧羌寇”，以功“赏赐奴婢数百口，畜物以千计”；王建“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又“赐僮隶五千户”。天赐元年（404年）十二月，拓跋珪还专门下诏班赐贵族奴婢：“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并且“皆立典师，职比家丞，总统群隶”。塞外使用奴婢劳动的习俗在塞内又延续了下来，《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描述了北魏平城宫殿使用奴婢的情形：“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贩卖，酤酒，养猪羊，牧牛马，种菜逐利。”北魏前期拥有的奴婢数量是相当多的，他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北魏还存在地位稍高于奴婢、隶属于官府的各种杂户。其中有从事纺织的“绫罗户”：“魏初，禁网疏阔，民户隐匿漏脱者多。东州既平，绫罗户民乐葵因是请采漏户，供为纶绵”；有从事金属冶铸的“金银工巧之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有专门淘金的“金户”：“汉中旧有金户千余家，常于汉水沙淘金，年终总输”；有世代煮盐的“盐户”：“郡有盐户，常供州郡为兵，子孙见丁从役”；有从事畜牧的“牧子”：“南秀容牧子万子齐真反叛”。此外还有城户、营户、军户、府户等等。杂户成份繁多，对官府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处于受奴役的境地。

必须指出，在北魏前期，奴婢主要从事家内和宫廷内的园艺、畜牧并服侍贵族，杂户主要从事手工业，他们已经逐步从社会的主要生产领域中退出。北魏前期的奴隶制度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既是由于拓跋部内氏族残余和习俗的抵制，更是由于在广袤的中原地区，农耕经济虽然遭到破坏，但毕竟拥有悠



久的历史传统，特别是经过曹魏的屯田、西晋的占田等形式，封建的租佃关系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反复。而作为拓跋部统治中心地区的京畿一带，由于中原经济的影响和统治者为适应新的环境而作出的抉择，也在通过移民定居、“计口授田”和征收赋调的方式，逐步恢复和发展农业，从初步形态的奴隶制度甚至直接从氏族组织向封建的经济关系过渡。这个过程，是经过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两代，到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基本完成的。

随着对各族人民大规模的征服，北魏向京畿及附近地区迁徙了大量的“新民”。拓跋珪灭后燕，于天兴元年（398年）“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又“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拓跋嗣永兴五年（413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于跋那山西，徙其“二万余家”并“置新民于大宁川（今河北张家口附近）”；泰常三年（418年）又“徙冀、定、幽三州徒何于京师”；拓跋焘太延五年（439年）平北凉，“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徙长安城工巧二千家于京师”；正平元年（451年），以南朝“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献文帝拓跋弘时攻克青州（在今山东），又于皇兴三年（469年），“徙青州民于京师”。先后迁往代都及周围地区的人数当在100万以上。大规模的持续移民，不但使原来以游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鲜卑等各族成员“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原有的氏族游牧经济结构逐步瓦解，而且在代北集中了大量熟练掌握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的汉族劳动人民。各族人民在这个地区散布杂居，由政府“计口授田”，并借给耕牛和其他劳动工具，从而形成无数个对生产资料拥有某种程度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单位。“新民”是发展代北的农业和手工业，并且直接向北魏统治集团提供粮食和徭役，满足其财政开支和修建城郭、宫殿、林苑需要的最重要的力量。“新民”体现了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文化包括中原汉族文化。他们在北魏的社会生活中日益活跃，是后来推动改革的重要社会基础。



刚刚跨入封建社会门槛的拓跋统治者,带有早先那个阶段特有的野蛮性和掠夺性。他们凭借征服者的地位和强大的武力,对各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

晋末以来的战争,导致大量土地抛荒,人口流徙,原有的户籍、品第已经十分紊乱。为了维持巨额的军费开支,养活庞大的贵族官僚阶层,填塞统治者日益增长的欲壑,北魏前期采取“九品混通”即重新把各地户口按贫富划为九等、由各户根据其资财品级分摊租赋总额的办法,规定平均每户每年向国家缴纳“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这已经是很不轻的负担了。然而北魏政府还经常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进一步榨取人民的血汗,北魏前期的临时征调十分频繁,如永兴五年(413年)正月,“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匹”;泰常三年(418年)九月,“诏诸州调民租,户五十石,积于定、相、冀三州”;泰常六年(421年)二月,“调民二十户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始光二年(425年)五月,“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六月,“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四至于河,广袤皆千里”,等等。而“内外诸司、州镇守宰等各级官员,更是任意征发,“侵使兵民,劳役非一”。特别是由于北魏前期未颁俸禄,大大小小的官吏乘机搜刮百姓,聚敛私财,“贪秽过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氏、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灭常山、赵郡贼;胡死,正灭并州贼;氏、羌死,正灭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驱使各少数民族进攻南朝,又借南朝的兵器杀少数民族,赤裸裸地暴露出民族压迫的本性。

北魏前期的野蛮统治,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害,人民“寒弱不能自贍”,“困于冻馁”,流离失所,以致“有卖鬻男女者”,而“豪富之门”,却“日有兼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人民被迫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当时有许多人为躲避繁苛的赋税徭役而逃亡,“羁旅他乡”,或“负嶮不供输税”。政府的财源受到严重威胁,统治者被迫一再下令检括户口。还有的地方“劫盗大起”,“屯聚林薮,拒射官军”,各族人民纷纷举起了武装



反抗的旗帜。

北魏前期规模最大的人民起义，是由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太平真君六年（445年），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揭竿而起，得到汉族和氐、羌、匈奴等各族人民的拥护，迅速发展到10多万人。盖吴派白广平西入安定（今甘肃固原），“诸夷酋皆聚众应之”；又遣兵进攻长安，河东人薛永宗起兵响应。到这年冬天，东起潼关，西至汧陇（今陕甘交界处），到处都燃烧着起义的烈火。拓跋焘气急败坏，被迫亲征，费尽全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盖吴起义虽然失败了，人民的反抗却有增无减。在孝文帝拓跋宏即位初期的十年间，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就有十几次，包括青州高阳（今河北蠡县南）的封辩起义，沃野（今度”。有的官员“断截官物以入于己，使课调悬少”，却“委罪于民”；有的官员“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两（辆）”，成为暴发户。对此，北魏政府曾经采取一些抑制措施，然而屡禁不绝，“虽动貽大戮，而贪虐未悛”，更有愈演愈烈之势。

北魏统治阶级在掠夺土地方面也毫不逊色。拓跋贵族进入中原以后，在保留游牧习性、大量圈占牧场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广占田园山泽，表现出十足的贪婪。拓跋焘的太子拓跋晃，就曾“营立私田，畜养鸡犬”；定陵公和跋因罪被处死，临刑前还嘱咐他的弟弟“濞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广为产业”。皇家和贵族占田过甚，上谷一带的贫苦百姓无以为生，被迫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至于秦汉以来势力急剧膨胀的北方豪强地主，更是连族聚亲，筑坞立壁，掠占田土，荫庇户口，对依附于其的部曲和佃客进行“倍于公赋”的敲骨吸髓的剥削。

北魏前期政治黑暗，法制败坏。“有罪者优游获免，无罪者妄受其辜”。刑罚种类多而残暴，“禁令苛刻，动加诛戮”。特别是有所谓“门房之诛”，“一人为恶，殃及合门”，辗转株连，备极惨酷。刑讯逼供也是花样迭出，骇人听闻，令囚犯不堪忍受。如当时使用一种“重枷，大几围”，又“以缢石悬于囚颈，伤内至骨；更使壮卒迭搏之。囚率不堪，因以诬服。吏持此以为能”。层





出不穷的冤狱加深了社会矛盾,统治者只好诉诸更为酷虐的刑罚,造成恶性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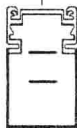
北魏前期社会具有鲜明的民族压迫的特点。拓跋统治者对各被征服民族肆意蹂躏,动辄屠戮。早在登国十年(395年)的参合陂之战后,拓跋珪就残忍地把多数是鲜卑慕容部人的四五万后燕降卒全部活埋。由于北魏前期战事频繁,甚至“九年之间,戎车十举”,北疆上的一些少数民族,经常被拓跋统治者征用于战争和掠夺,或是镇压其他民族的反抗。但这些少数民族自己也受到北魏军队的监视和欺凌,处境十分悲惨。当北魏政府对外用兵时,总是驱使各被征服民族的士兵在前冲锋陷阵,以血肉之躯抵挡矢石,填塞壕堑,每每死伤枕藉。正平元年(451年),拓跋焘率军南征,包围了刘宋的盱眙城(今江苏盱眙北),写信给守城将领臧质,劝他出兵决战。信中声言:“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内蒙古五原西北)、统万二镇的敕勒族起义,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的司马小君、刘举和沙门慧隐起义、洛州(治今河南荣阳)的贾伯奴起义、豫州(治今河南汝南)的田智度起义以及徐兖一带的司马朗之起义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各族人民连绵不断的起义、反抗,给了北魏统治者很大的震动。显然,在从塞外进入中原、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并且逐步实现生产关系封建化的过程中,在政治上继续推行奴隶制式的野蛮严酷统治,一味崇尚武力,只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重蹈十六国期间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迅速毁灭的覆辙。

三

长期的战乱,不仅严重摧残了北方的社会经济,而且剧烈破坏了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传统。

孔子在春秋末期创立的倡导“德治”和教化的儒学,既是一种为统治者设计的治国安邦的经略,也是一种为士大夫阶层提供的修身立命的基本准则。然而,春秋末期以后,从诸侯竞雄割





据到统一王朝建立,提倡严刑峻法的商韩之说一家独尊。带有过多理想化成份和粗陋迂腐特点的早期儒学,则未能赢得统治者足够的重视,充其量不过是诸子百家中较受压抑的一家。秦代甚至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策。到汉武帝时代,随着“大一统”王朝的日渐巩固和专制制度的逐步强化,统治者连年征战,赋敛繁苛,导致海内虚耗,百姓怨嗟,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和发展。法家、黄老学说早已先后衰微,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于是儒学的价值被重新发现。曾上“天人三策”并为汉武帝所采纳的董仲舒等人,承担了对传统儒学进行加工改造的工作。他们摒弃了儒学中的粗鄙成份,保留了儒学精粹,同时批判地吸取、糅杂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派学说的思想材料,创立了一种以鼓吹“天人感应”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的礼义教化,以及德刑并用、辨别华夷等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新儒学。这种新儒学,道应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的要求,因而倍受赏识。特别是经过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以及东汉的白虎观会议,被涂上一层神秘色彩,确立为正宗国学。

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开始对儒家经典的大规模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东汉初,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汉明帝刘庄更是亲自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统治者的这种带有粉饰太平意味的做法起了倡导和推动的作用,于是东汉出现了大批专事儒经章句注疏、聚徒传授的学者,“编牒不下万人”。其著名者先后有贾逵、马融、郑玄等,或“门徒数百人”,或“教养诸生,常有千人”,其中有的“不远万里之路”,“赢粮动有千百”。真可谓“济济乎,洋洋乎”,盛极一时。

东汉的世家大族,深受儒学熏陶,成了传播儒学的另一类载体。如颍川(今河南许昌东)荀氏、汝南(今河南息县)袁氏、涿郡(今河北涿县)崔氏、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杨氏等,都以读经、习儒为世代延续的家风,并以学问名节、道德文章相标榜,著称于时,所谓“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



在士大夫和名儒的推动与影响下,儒学从统治阶级上层渗透到了整个社会,成为一般知识分子和地主家庭所崇尚的学问、所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修养准则。

在中原地区,这种风气世代熏染、传嬗,日渐浓郁,并且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思想文化传统。

到汉末和魏晋,在军阀割据混战和世族门阀统治的背景下,曾经先后兴起似乎偏离正统儒学的以曹操为代表的“拨乱之政,以刑为先”的刑名、法治思潮,和以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人为代表的手执麈尾、口谈玄虚式的清谈与玄学思想。细绎其思想源流,那位横槊赋诗、戎马一生的曹操,却有着儒家“法先王”般的政治激情;而主张“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的玄学,则主要是适应在正始(240年—249年)、嘉平(249年—254年)等年代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士大夫空虚颓废和愤世嫉俗的精神面貌的。魏晋时代统治者和大族的骨子里依然是尊崇儒学。他们“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修立学校,临幸辟雍”,“尊儒勤学”,继续倡导研习儒经。而社会上的一般知识分子,也仍然以儒学世代相传。中原思想文化传统经受住了考验,紧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发展。

西晋末年的情形则有所不同。司马氏政权的腐朽、暴虐,导致了各地的流民起义。各少数民族的首长和豪帅,乘机举起反晋旗帜,在北方展开了连年的混战。往日威严矜持、不可一世的门阀大族们仓惶四散。许多大族随司马睿南渡,“避乱江左”,建立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另一部分士族则流寓河西前凉。这样,滞留在中原地区的大族就不多了。在战火烽烟、刀光剑影中,他们朝不保夕,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而中原的“衣冠文物”、书籍典册也大多散佚,儒家思想文化传统遭受了一次空前的劫难,正所谓“自晋永嘉之后,……生民不见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马之迹,礼乐文章,扫地将尽”。

然而,在腥风血雨中,中原儒学再一次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早在西汉初年,儒生陆贾在晋见刚刚推翻暴秦的汉高祖刘